曾纪泽与《中国先睡后醒论》

曾纪泽（1839——1890年）是晚清封疆大吏曾国藩之子，亦是近代中国杰出外交官。1887年1月，时任驻欧外交官的曾纪泽，以英文撰写《中国先睡后醒论》，发表于《亚洲季刊》。文中，他秉持不卑不亢的态度，清晰阐释中国具备觉醒能力，但觉醒后不会对外侵略的核心观点。《中国先睡后醒论》是中国官方向世界介绍古老文明与中华民族的重要发声，在近代中国影响深远，众多救亡图存之士也将“睡狮”概念的源头追溯至此。 李金飞

“睡”是暂时状态

根据英国参赞马格里的记载，正是他建议即将归国的曾纪泽撰写一篇“关乎他的祖国的未来”的文章。曾纪泽经深思后认为，确有必要向外国展现真实的中国。在《中国先睡后醒论》中，他既未刻意宣扬古老中国的辉煌历史，也未因当时国弱民衰的处境流露卑怯，而是巧妙以从“睡”到“醒”的状态转变来阐释中国。不难看出，曾纪泽的词汇选择蕴含着明确且强烈的政治目的：一方面是提醒西方列强“侵略必败”的最终结局，另一方面向列强传递关键信号，在面对侵略时，中国已不再逆来顺受，正逐渐走向觉醒。

近代以来，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屡遭败绩，这让欧洲逐渐形成“即一陵夷衰微，终至败亡之国”的认知。这种认知进一步助长了列强的侵华野心，在他们眼中，中国俨然成为可随意瓜分的“待亡之国”。这种带有“殖民”的心态与行为，给中国造成了无尽的灾难。《中国先睡后醒论》深入分析了这一认知形成的关键原因，即“中国古昔之盛与近今之衰，判若霄壤”。毋庸置疑，中国从鼎盛到衰落的断崖式下滑，让侵略者误以为中国“精力业已消铄殆尽”，从而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侵略政策。

曾纪泽并未回避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屡次战败的客观史实，但明确指出——战败并不等同于灭亡，这也是全文的核心观点。他强调：“中国不过似人酣睡，固非垂毙也。”“睡”是暂时的，终究会“醒”；而“垂毙”意味着走向不可逆转的“死亡”，二者存在本质区别。他进一步剖析中国陷入“沉睡”的根源：古代中国长期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，这种优势逐渐滋生了“日有侈心”，具体表现为“自以为金瓯永固，固无待舍旧而谋新”。尤其是对于“和战攻守”的“漠然不知”，最终导致国家在时代变革中逐渐落后。

关于中国当时的发展状态，曾纪泽明确指出，自鸦片战争后，中国已开始逐渐走向觉醒，“沿至道光末年，沉睡之中国，始知己之境地实在至危至险，而不当复存自恃巩固之心。”然而，此时的觉醒并不是“全醒”，更多的是在列强侵略刺激下的“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”。直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，中国才真正开始对自身“沉睡”状态进行主动认知与深刻反思，意识到“始知他国皆清醒而有所营，为己独沉迷酣睡”。

曾纪泽对中国“由睡到醒”的界定，并非单纯的情感建构，而是基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变革，尤其是清政府正在推行的洋务运动。洋务运动以“自强”和“求富”为目标围绕内修国政、外保国体实施了一系列举措。尽管曾纪泽并未明确回答这些举措对中国觉醒的推动程度，当时也有质疑者发出“中国果醒矣乎？”的疑问，但结合他撰写此文的初衷可知，他意在通过这些变革事实，向外界传递出中国正在摆脱“沉睡”状态的关键信息。

“醒”是未来走向

作为继郭嵩焘之后晚清政府派出的第二任驻外公使，曾纪泽在欧洲期间，既深切感受到西方国家的强大，也为祖国的衰弱现状忧心忡忡。如果说“睡”字是用来描述中国当时的状态，而“醒”字则是表达了他对于未来中国走向复兴与强大的信心与期待。在《中国先睡后醒论》中，他着重阐述了一个针对性极强的观点：中国“全醒”以后，并不会威胁世界的和平。这一观点的核心目的是向列强表明，无需为虚构的“中国威胁论”担忧，更不应刻意阻挠中国觉醒。



曾纪泽以中国历史发展为依据，指出中国自古以来便是“自守之国”，因此“向无侵伐外国之意”。未来的中国绝对不会影响世界的和平，“嗣后，亦决无借端挑衅拓土域外之思”。针对当时西方对中国庞大人口的误解与抹黑，曾纪泽指出，“中国本无人满之患，无须别寻新地以为游民寄居”。直接戳破了列强以“人口过剩”为由，渲染“中国威胁”的谎言。曾纪泽强调，中国人口众多，但同时也拥有广袤的土地，因此“中国所应为者，不在使民谋食于外国，乃设法将民分置于国内”。近代以来，屡有外国人宣传“中国人口过剩”，甚至把中国人污蔑为“黄祸”，其背后侵略逻辑可谓是不言自明，即通过制造虚假舆论，为侵华行径寻找借口，这是帝国主义惯用的伎俩。

然而，现实并未如曾纪泽所愿。《中国先睡后醒论》发表后，虽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，“欧洲诸国传诵一时”，但文中真挚的和平诉求，并未触动侵略者的野心。此后，列强侵华步伐不仅没有停止，反而愈发密集。这一结果深刻揭示了近代中国的尴尬处境：在国弱民衰的背景下，即便有理有据的外交发声，也难以获得平等话语权。

“睡狮”概念的思想源头

在《中国先睡后醒论》中，曾纪泽着重关注了中国由睡到醒的转变状态，但通篇近四千的文字中并未提出“睡狮”的概念，甚至也没有出现“狮”的字眼。然而在近代中国，众多救亡图存之士却将“睡狮”一词与曾纪泽撰写的《中国先睡后醒论》紧密关联，或将其视为“睡狮”概念的重要渊源。这种“无中生有”的现象，恰恰印证了《中国先睡后醒论》的持久影响力。

从史料考证来看，近代中国最早提出“睡狮”一词的是梁启超。1899年4月，他在《动物谈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昔支那公使曾侯纪泽译其名，谓之睡狮；又谓之先睡后醒之巨物。”自此以后，很多文献均将曾纪泽视为“睡狮”概念的提出者。不过，关于“睡狮”的起源，在近代中国始终存在争议：有学者将其视为外国给予中国的歧视性词汇，也有学者把拿破仑作为“睡狮”的最早提出者。但毫无疑问，曾纪泽的《中国先睡后醒论》被认为是国人语境中“睡狮”概念的重要思想源头。 据《学习时报》

熊十力的两个“极端”

熊十力是我国著名哲学家，曾在北京大学任教。他是一个除治学之外一切都不顾的人，所以住所苛求安静。

20世纪30年代初期，他住在沙滩银闸路西的一个小院里，门总是关着，门上贴的一张大白纸上写道：“近来常常有人来此找某某人，某某人以前确是在此院住，现在确是不在此院住。我确实不知道某某人在何处住，请不要再敲此门。”看到的人都不禁失笑。

20世纪50年代初期，他住在什刹海银锭桥，夫人在上海，想到北京来住一段时间，顺便逛逛，他不答应。他的学生知道此事，婉转地说：“师母来也好，可以买菜做饭，您老一心修功课。”他毫不思索地说：“别说了，我说不成就不成。”他夫人终究没有来。后来他移居上海，仍旧是孤身住在外边。

熊十力也不注意外表，衣服像是定做的，样子在僧与俗之间，袜子是白布的，高筒、十足的僧式；屋里木板床上面的被褥等都是破旧的。没有书柜，书放在破旧书架上，只有两个箱子，一个是柳条编的，几乎腐烂了，另一个是铁皮的，旧且不说，底和盖竟毫无联系。他回上海之前把这铁箱送给学生，学生嫌笨重扔了。

熊十力做学问却是另一个极端，过于认真。他的自信力很强，近于固执，在学术上绝不对任何人让步。

熊十力是黄冈人，冯文炳是黄梅人，他们都研究佛学，又都相信自己最正确，可所信不同。有一次，学生去找熊十力，听见他又在和冯文炳争论，熊十力说自己意见最对，凡是不同的都是错误的。冯文炳答：“我的意见正确，是代表佛，你不同意就是反对佛。”双方争起来互不相让，学生只好忍着笑走了。

倪世俊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

吴青霞香港作画

20世纪90年代，步入耄耋之年的著名画家吴青霞依然精力充沛、宝刀不老，她不但思维敏捷，步履稳健，而且挥毫如常，并热心参加社会活动，关心国家大事。吴青霞任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，还担任民革上海市委会香山书画社社长及诸多书画社团的艺术顾问，虽年事已高，但对所负社会职责丝毫不懈怠。

1997年7月1日，香港回归祖国。为见证和纪念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，香港特别行政区举办了一系列庆祝活动，其中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尤为丰富。是年5月，吴青霞与上海书画界多位知名人士应邀来到香港，办展作画、观光写生，心情非常愉快。

返回上海后，她对前来接她外出参加展览活动的上海香山书画社社员说：“这次5月1日去香港，5月8日回上海，真正开心咧！一共去了10个人，程十发、程多多、邵洛羊、韩天衡……很闹忙；有晨光观光，香港九龙风景好，特别是夜景更美。这次香港东方国际电视公司招待非常热情周到。我们10人在一丈二尺宣纸上合作画画，我画的是柏树，这幅画于6月29日已挂在香港会展中心大厅里了。另外还合作了两张大画，一张拍卖了，另一张也定购了，卖到钞票几十万元，全部捐给慈善事业了。”她不禁又回忆起1995年首次应邀到台湾举办画展的情景，喃喃道：“香港回归，交关开心！香港回来了，台湾也快了。一国两制，名垂青史。”

晚年的吴青霞，想到最多的还是“叶落归根”和一生艺术创作的归宿。她曾多次对家人说：“画放在家里只能给少数人欣赏，捐给国家就可以让更多的喜欢书画艺术的人欣赏，可以更好地为社会服务。”家人非常理解老人的心愿，一致表示支持，并积极地配合她与家乡政府联系、沟通，转达她对故乡的一片深情与人生夙愿。 刘兴尧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